



早期儒家《诗》论及其 哲学意义

ZAOQI RUJIA SHI LUN JIQI ZHAXUE YIYI

王国雨◎著



人民出版社

早期儒家《诗》论及其 哲学意义

ZAOQI RUJIA SHI LUN JIQI ZHAXUE YIYI

王国雨◎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儒家《诗》论及其哲学意义/王国雨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01-018010-6

I. ①早… II. ①王…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7478 号

早期儒家《诗》论及其哲学意义

ZAOQI RUJIA SHI LUN JI QI ZHIXUE YIYI

王国雨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18010-6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Brief Introduction

透过对早期儒家《诗》学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早期儒家引《诗》、论《诗》材料可以看做儒家哲学议题的表述者、承载者与引发者,已深度参与到早期儒家哲学,尤其是心性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建构之中。“兴于《诗》”可以看做早期儒家哲学的表达方式。本书之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立足于经学讲哲学”、“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这一儒家哲学特质的理解。

本书系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诗经》诠释与早期儒家哲学的生成” (12YJC720033)
的成果之一、2011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1JCZX01YBM) 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王国雨(1978—),河南省扶沟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早期儒家哲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近年来先后在《江淮论坛》、《中国高教研究》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5项研究课题。2013年,主讲课程“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修养”入选首届“浙江省高校德育精品选修课程”。

责任编辑:洪琼
封面设计:林芝玉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节 经典意识问题	1
第二节 早期儒家论《诗》研究的意义	5
第三节 早期儒家《诗》学研究概况	8
第四节 研究内容概说	12
第一章 《诗》的儒家经典化	16
第一节 早期儒家与《诗》的“相遇”	16
一、春秋末期《诗》的存在方式	17
二、孔子与《诗》儒家经典化的开启	35
三、其他学派的《诗》学观	44
第二节 《诗》儒家经典化的途径	47
一、《诗》学传承与诠释	49
二、早期儒者著述的大量引用与解读	55
第二章 早期儒家《诗》学文献分析	61
第一节 早期儒家论《诗》的文献类型	61
一、两种文献类型	61
二、“说《诗》”与“引《诗》”	64
第二节 早期儒家引《诗》论《诗》文献概述	65
一、各文献中引《诗》论《诗》文献概述	65
二、论《诗》文献分类	79
第三节 著述引《诗》之体例与特征	89

一、引《诗》体例	90
二、引《诗》特征	97
第三章 “兴于《诗》”与早期儒家哲学的表达方式	99
第一节 “兴于《诗》”的经典诠释意义	100
一、“兴”与“《诗》之兴”	100
二、孔子《诗》学中的“兴”	102
三、早期儒家“兴于《诗》”的限度	104
第二节 早期儒家“兴于《诗》”的哲学表达	106
一、《孔子诗论》：解《诗》以“兴发”儒学主张的专文	106
二、子思学派著述中的《诗》之“兴”	110
三、孟子“兴于《诗》”的王道仁政哲学	114
第四章 “《诗》言志”与早期儒家的性情论	116
第一节 早期儒学语境中的“《诗》言志”	117
一、“《诗》言志”的儒学要义	117
二、解《诗》志以达己意	121
第二节 “礼后乎”：早期儒家《诗》论中的“情”与“礼”	124
一、“礼乐之原”	126
二、由情入礼	129
三、情之所指	133
第三节 “形于内”：早期儒家《诗》论中的“心”与“天”	138
一、化用《诗》句	139
二、对“慎独”的论证	141
三、心中的天道	146
第五章 《诗》之诠释与早期儒家政治哲学的建构	151
第一节 德性政治之典范：《诗》在子思政治哲学建构中的作用	153
一、“子曰《诗》云”叙述模式分析	154
二、简本《缁衣》的启示与子思学派政治哲学的主题	157
三、引《诗》在子思政治哲学建构中的作用	161

第二节 王道仁政之实录:《诗》在孟子仁政哲学建构中的作用	163
一、“迹熄《诗》亡”说辨义	164
二、《诗》乃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孟子引《诗》分析	166
三、“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解读	172
第三节 “隆礼义”之载体:《诗》在荀子哲学建构中的作用	179
一、荀子的经典观与《诗》学观	179
二、“隆礼义”之载体:荀子引《诗》分析	188
结束语	199
参考文献	202
附录:早期儒家引《诗》资料汇编	210

引言

第一节 经典意识问题

谈到早期儒学的特质,必须说,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概括的“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一语颇为中肯,尤其是“留意”二字点出了儒家颇重从经典文本(“六经”)中诠释出自身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主张。^①然而,为什么早期儒家如此重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经典文本呢?毕竟我们看到,儒家之外的道家、法家等对此均持批评态度。换言之,经典之于早期儒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何在呢?对此,《庄子·天运》篇曾经很尖锐地提出过质疑: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②

这显然是站在道家立场上对儒家提出的批评。道家认为,儒家之“六经”是

^① 这可以看做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诸子百家”的重要特征和儒家全面承继三代文明传统的重要表现。孔子及其儒家承前启后,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具“经典传统”和经典解释传统的文化国度。

^② 郭庆藩:《庄子集释》(全四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31—532页。

“先王之陈迹”而不是“所以迹”，先王之“道”无法通过文字记载并传递^①。因此，就“六经”以求“先王之道”是无解的。然而，孔子及其儒家则认为，所谓“先王之道”，其实就保存在“六经”之中，“六经”正是先王之道的载体，即先王的“所以迹”蕴含于“六经”具体文本之中，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诠释，“先王之道”便可得以彰显并昭示当下。这便是儒家孜孜不倦地传习“六经”的根本理由和经典意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不能对早期儒家的经典意识具有“了解之同情”，常导致我们无法解读出经典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生成中的意义。关于当代中国人的经典意识，台湾谢大宁先生曾这样说：

基本上，我们今天经常只以某种“文化遗产”来看所有的经典……今天人们当然承认经典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但原则上它也只是众多文化载体中的一种，只不过它是较重要的一种而已。它和其他载体本质上还是同质的、平列的关系，其差别只是量上的、重要性上的差别而已。这就像我们今天走进任何一个博物馆一般，其中的任何一种文物，都在诉说着这个文化，而我们仿佛以一个异文化的旁观者一般，对这些文化产物投以疑惑、赞赏以至理解等等不一而足的反应，经典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如此。关于这点，我们只需要回味一下顾颉刚乃至多数古史辨学派学者的经典意识，便可以清楚看到。^②

的确，我们今天很少从某种生命价值的具体实践与体验的角度看待经典。应该说，对今天我们“把经典推出去作为一个认知对象”的经典意识，当代西方

① 《庄子·天道》篇通过桓公与轮扁的故事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圣人之书乃是古人之“糟魄”，真正的圣人之道“不可传”。其文曰：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全四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0—492页。

② 谢大宁：《比兴的现象学——〈诗经〉诠释进路底再检讨》，《南华通识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哲学诠释学有深刻反思与洞见,认为解释者与经典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应看做相互对话的参与式关系。回头来看早期儒家,我们发现其从未将“六经”看做“认知对象”,不曾有求取经典文本“原义”的行动,对他们而言,经典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是“在场”的。如透过《易传》我们看到,早期儒家通过对《易》的解读,将阴阳变易法则认作天道、地道、人道的共同根本规定性,从而圆融地建构出了会通天道、人道的天人学体系;透过上博简《孔子诗论》我们看到,早期儒家将对《诗》的解读与自己的感悟融为一体,谈出了“吾善之”、“吾喜之”、“吾信之”、“吾美之”、“吾敬之”等读《诗》心得。试想,如果没有投入生命的体验与价值眷注,没有对经典中蕴含着“先王之道”的执着信念,孔夫子怎么会“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地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呢?怎么会时时教导子弟门人“学《诗》”、“学礼”且欣赏诗乐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呢?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便容易弄清现代学者的认识误区。以对早期儒家论《诗》的批评为例。正是站在应将经典文本当做“认知对象”加以客观认识的立场上,在20世纪的20年代,顾颉刚先生写出了著名的《〈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一文,认为“两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像样子了”,迫切需要斩除“葛藤”,厘清“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在文章最后批评孟子论《诗》时的态度最鲜明:

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然是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但既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便应对于历史做一番深切的研究,然后再去引《诗》,才是道理。他竟不然,说是说得好看,做出来的依然和春秋时人随便用《诗》的一样,甚而至于乱说……造出春秋时人所未有的附会,下开汉人“信口开河”与“割裂时代”的先声,他对于诗学的流毒到了这般,我们还能轻易地放过他吗!①

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不能站在寻求“诗本义”的立场上解《诗》,即不对历史“做

① 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原刊于《小说月报》第14卷3—5期(1923年3月10日—5月10日)。本书引自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一番深切的研究”就去引《诗》、论《诗》便是“乱断《诗》”，只能造成“许多附会”。既然是“附会”，便无价值可言。由于顾先生将《诗》的经学生命视为需要斩除和清理的“葛藤”，当然也就不会承认经学发生史意义上的早期儒家《诗》学的意义了，进而也就无法看出《诗》学之于早期儒家思想建构的意义。^① 诚如学者的共识，我们无法否定“古史辨”的成绩和理性态度，但以“《易》本来是卜筮，《诗》本来是乐歌，我们不过为它们洗刷出原来的面目而已”^②的态度看待早期儒家的经典诠释，显然没有懂得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存在于不断被诠释的过程中，正如柯马丁（Martin Kern）曾经针对《诗》所指出的：“诗歌的真正意义在于对它的恰当运用”，“对诗歌的理解不在于其文字的表层，而是依赖于同时牵涉了听众、赋诗者的诠释过程。”^③这里虽然有“诠释的有效性”问题，但必须说，早期儒家正是在“六经注我”式的经典诠释中建构出了自己的哲学。这让我们想起美国思想家卡勒（Culler）的话：

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④

要认识到，早期儒家的经典之学的中心并非诠释“经典文本”本身，而是意在借彰显经典文本中的“道”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为当下“立法”，因此必然有自己的“新义”，而不可能忠实于经典所谓的“原意”。此外，更多的学者从现代“文学”的概念出发，强调“纯文学”的价值，预设“尚文”价值高于“尚用”，将早期儒家的《诗》学概括为表达伦理道德教训之用，并进而贬抑儒家《诗》

① 郭万金先生在其《〈诗经〉研究六十年》一文中指出，《诗经》的经学诠释在近六十年中几近失声，而各种层次和角度的文学阐释之音甚嚣尘上。总结“五四”以来的《诗经》学研究，必须在肯定还《诗》以“诗”之本色的同时，更要认识到，《诗》曾为“经”的历史真相不能割舍、不能抛弃、不能忽视。该文刊载于《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应该说，早期儒家的论《诗》活动，也必须置于经学发生史的脉络中和意义上，才能获得恰当的解读。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③ [美]柯马丁（Martin Kern）：《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④ [美]卡勒（Culler）：《为“过度诠释”一辩》，见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学,这更是“刑求古人”的经典意识。

总之,在早期儒家看来,《诗》不仅是“诗”,更是饱含“先王之道”而有待发掘出“当代”价值的权威性经典文本,他们对《诗》有投入生命的体验。对早期儒者而言,《诗》绝不仅是“缘情”的“诗”,他们并无暇留恋于对《诗》的文学欣赏,也无意于恢复《诗》的政典身份,他们眷注的乃是如何通过对《诗》之内容和意义的诠释,从中发掘出对当下的意义和启示。这就是早期儒家体现于《诗》学层面的经典意识。

第二节 早期儒家论《诗》研究的意义

“诗三百”作为早期儒家面对的经典文本,其重要性在儒家学派内部是没有异议的。这不仅体现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引《诗》是最多的^①,更在于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开始,儒家对《诗》的关注度也是最高的,如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以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论,将《诗》教放在了儒家教育最基础、最根本的地位上;孟子被称为“序《诗》、《书》”、“尤长于《诗》、《书》”的大儒,从其“迹熄《诗》亡”说及“引《诗》证说”实践可以看出,《诗》被孟子当做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荀子虽然“隆礼义而杀《诗》、《书》”,但行文引《诗》最多,且从传经之儒的角度看,对汉代各家《诗》学均影响甚大。就“六经”之间的地位而言,“以《诗》为首”是多数早期儒者对“六经”次序的基本判定,大约只有早期儒家易学派对此有不同看法。^②

然而,虽然学界已注意到论《诗》、引《诗》是早期儒家著述的一个突出特征,但《诗》之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的作用,学者尚未给予充分解读。换言之,《诗》作为早期儒家重视而熟悉的经典文本,在早期儒家哲学的

① 从本书相对严格的统计来看,早期儒家著述中引《诗》达 200 余处。墨家虽不排斥《诗》,但《墨子》引《诗》仅 11 处,其他如道家、法家则对称引《诗》、《书》持批判态度。

② 廖名春先生在《“六经”次序探源》一文中认为:“《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后,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参见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生成过程中产生过哪些影响,发挥过何种作用尚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既然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揭示的,重视经典诠释是早期儒学的根本特征,那么,为深入把握早期儒家的思想生成和哲学建构机制,便需对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的关系认真探讨。因此,本书拟以早期儒家引《诗》、论《诗》活动为考察中心,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①,在前修时贤的成果基础上,深入探究早期儒家诠释《诗》与其哲学阐发之间的关系。

随着对马王堆帛书、郭店竹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清晰地认识到,早期儒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经典诠释学(或称“六艺之学”、“经典之学”)和社会人生之学。由于“如何解决社会和人生困境”的“道”的问题,即“社会人生之学”是早期儒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所以,“社会人生之学”“是一条主线,而经学或者六艺之学则是一条辅线”^②。的确如此,《论语》、《孟子》、《荀子》等皆是以阐发儒学主张为中心的典籍,涉及“六经”时也不拘泥于具体文本,采取“六经注我”式的态度为我所用。可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六艺之学”,即以解读“六经”文本为主题的儒家文献也曾大量存在,虽然多湮没于历史烟尘中而不为后人所见。上博简《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易传》等文献的出土,以及屡见于早期儒家著述中的“传”、“记”、“解”、“说”等诠释“六经”之术语的形成^③,均可证明这一点。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早期儒家哲学的生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其思想建构与其经典诠释之学两者之间具有内在互动关系。这首先体现在早期儒家中

① 孟庆楠先生认为:“以往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论《诗》、解《诗》材料为基本素材。而有关《诗》的编纂、传习、应用情况的记述,由于其主旨都不在于思想的阐发,因而多被作为辅助性材料来使用。在这种认识下,先秦时期可供思想研究的《诗》学材料十分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赋《诗》、引《诗》的记载中分析、把握用《诗》者对《诗》的理解。此外,《诗》学思想的表达也并不局限于对《诗》的理解。引《诗》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纽带,将引《诗》所佐证的思想观念联结在一起,并由此组织起一个自由的《诗》学义理空间。引《诗》条目的组织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独立的篇章中自由地表达其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见解。这构成了《诗》学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参见《经学思想史视域中的先秦〈诗〉学文献——对〈诗〉学思想表现形式的反思》,《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的确,如何全面而恰当地运用早期儒家《诗》学文献,对于推进早期儒家《诗》学研究本身,极为重要。

②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页。

③ 王中江:《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

侧重诠释某一经典文本的早期儒者那里。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早期儒家的“经学家型人物”并非没有思想,“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家型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①,“他们是儒学成为‘世之显学’的‘幕后英雄’,没有他们,所谓的‘弘道之儒’就会失去丰厚的思想资源和文本依据”^②。同时,我们也必须说,作为思想家型的哲人,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孟子、荀子既是早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早期儒家经学的阐释者、传承者,并且均提出过经典诠释之学的重要命题。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开早期经学讨论早期儒家哲学,二者应该是相互发明的关系。事实上,关于早期儒家论《诗》在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除了早期经学意义上的儒家“《诗》学文献”^③、传授世系的提示之外,早期儒家著述中大量的引《诗》、论《诗》材料均是有待深入发掘和分析的。

基于上述考虑,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其哲学思想建构的关系,至少具有如下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能够深化对早期儒家经学(经典之学)与哲学之关系的认识。早期儒家的经典之学并非独立于其社会人生学说阐发之外,而是相互发明关系。早期儒家“引经据典”皆非为了单纯解释经典文本,而是意在将《诗》等经典文本作为其哲学议题的承载者、表述者和引发者。第二,能够加深对早期儒家哲学之生成和特质的理解。早期儒家哲学本质上可以看做儒家“士人”因应时代需要对《诗》及其他经典文本创造性诠释和转化的结果,所谓“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兴于《诗》”之“兴”构成了早期儒家的哲学表达方式;《诗》“会古今之志”的经典定位对早期儒家心性之学影响深刻;《诗》教“温柔敦厚”对儒家的教化哲学、“迹熄《诗》亡”的“以《诗》为史”诗学观对儒家王道仁政哲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有助于拓宽

①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② 拙文:《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③ 王博先生提出,早期儒家“《诗》学文献”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形式上的,即文献称引和解释《诗》,而不涉及《诗》之外的其他典籍,如《孔子诗论》、《中庸》、《五行》;第二是内容上的,对《诗》的称引和解释与其主题有内在关联。参见王博:《〈民之父母〉与〈诗〉学》,见《哲学门》(2003年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诗》学研究视野,重新审视《诗》在前经学时代的经典身份。同时,还原《诗》被 20 世纪疑古思潮以来仅被视为“文学”或“史料”的“历史真相”,也有助于在孔子和经典文本不再具有神圣性与绝对真理性的现代社会中,启迪我们寻找文化经典焕发当代生命的路径。

第三节 早期儒家《诗》学研究概况

早期儒家的《诗经》诠释问题一直是早期经学和儒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简述如下。

第一,早期儒家经典诠释学研究获得新进展,为深化先秦儒家《诗经》诠释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傅伟勋先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①,成中英先生提出“本体诠释学”^②,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与诠释学方法。稍后,同样是受西方诠释学启发,台湾的黄俊杰先生从孟学诠释史论入手探讨传统经典诠释学,对诠释的循环性、诠释者的历史性、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之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剖析^③;大陆的汤一介先生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设想,并参照西方解释学梳理了中国丰富的注疏传统^④。较有系统地探讨一般意义下的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类型、特质及方法的著作还有周

① 傅伟勋在其《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0 年版)中,提出作为诠释的方法理论的“创造的诠释学”,认为诠释可分为如下五个步骤:1.“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实谓”)2.“原作者真正意味什么?”(“意谓”)3.“原作者可能说什么?”(“蕴谓”)4.“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5.“作为创造的解经家,我应当说什么?”(“必谓”)潘德荣先生在《诠释的创造性与“创造的诠释学”》(刊于《中国哲学史》2002 年第 3 期)一文中对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有深入分析。

② 成中英先生的系统性论述参见《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他注重诠释的本体论意蕴,将诠释分为“基于本体的诠释”和“寻找本体的诠释”,“本体”会随“境”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是动态的“自本体”,而不是静止的“对本体”。成中英将他的诠释系统分为“本体意识的发动”阶段和“理性意识的知觉”阶段。

③ 黄俊杰论著宏富,关于经典诠释学的主要有《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及系列收集在其主编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中的论文等。

④ 汤一介:《和而不同》,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此后,汤一介先生还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探讨此问题。